

人的記憶中，卻不為年輕人所知，正是歷史斷層的明證。一個不用記住外來統治者所給予的神話的民族，毋寧是幸福的。然而如果為了掃除政治神話而把過去的記憶一掃而光，是否明智，則值得深思。「國歌少年」只是一個塵封的、孤立的記憶嗎？還是一連串還在進行的政治神話中，有助於我們瞭解自己的一環呢？但願，更多的研究能給我們答案。

原刊於《歷史月刊》第三十二期（1990年9月）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增補修訂

補記：日本國歌（君が代）的歌詞為：「君が代は / 千代に八千代に / さざれ石の / いはほとなりて / こけのむすまで」。中文似無定譯，中國大陸有一譯文作：「吾皇盛世兮 / 千秋萬代 / 砂礫成岩兮 / 遍生青苔 / 長治久安兮 / 國富民泰」。私意認為這是「演義」的譯法，有「國歌」的堂皇和縹麗，也充分傳達了文意。不過，我在本文中采取了這首賀歌最原初的意思；或許回歸最素樸的文字，可以保留此詩所蘊含的美學上的潛能吧。

（2002年12月）

## 「莎勇之鐘」的故事及其周邊波瀾

人類的歷史充滿無數的故事。有些故事因為滿足特定族群心靈上的共同需要，比較具持久性，甚至可以提昇到藝術的境界而歷久彌新。有些故事則是應特殊時代的特殊需要而產生，時過境遷後極易被人遺忘。但也由於這類故事的時代性特別強，透過對它們的重新整理，往往可以幫助我們掌握到一個時代的特殊風貌與氣氛。五十年前在臺灣經官方大力品題而膾炙人口的「莎勇之鐘」（サヨンの鐘）正是這樣一個實例。

「莎勇之鐘」的故事，人事淹遠，已經不再是臺灣人群體記憶中繼續傳承的一則故事，但是，它的影跡並未完全泯滅。不少喜歡唱老歌的人會唱一首叫「サヨンの鐘」的日文歌；此歌的中文翻版是「月光小夜曲」。這首歌只是當時發揚「莎勇之鐘」這個故事的眾多活動之一。

「莎勇之鐘」，簡單來說，是一位山地少女莎勇為日本老師犧牲性命而獲得臺灣總督贈鐘褒獎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莎勇·哈勇，<sup>(1)</sup>生於一九二二年一月，是蘇澳南澳利亨社哈勇·麥巴歐的最小女兒。利亨社（又作利與邊，在今南澳鄉澳花村）屬泰雅

(1) 本文作「莎勇」，係日文「サヨン」(sayon)之音譯，據泰雅族人稱此名音近於「sayun」，因此有作「莎韻」，或「沙鶯」者。由於「サヨン」之呼法因襲甚久，茲仍沿用之。

族，該族不稱姓，在命名習慣上採連名制，子女通常在自己的名字後面加上父親的名字，這是為什麼哈勇·麥巴歐的女兒叫莎勇·哈勇的緣故。莎勇在利有亨教育所接受等同於小學的簡易初等教育，畢業後被編入當地的女子青年團。青年團的組織最初是為了對小學畢業生做學後公民教育而創立的，一九三〇年代中期由於日本對中國的侵略轉劇，戰爭氣氛高漲，青年團連帶成為動員組織。青年團男女分開受訓，男子的組織逕稱青年團，女子則稱為女子青年團。

一九三八年（昭和13年）秋天，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正如火如荼地向長江中游推進，大舉發動所謂的「武漢大攻略戰」。就在這個時候，利有亨社教育所的老師田北正記警手收到召集令，必須離職出征，警手是當時山地警察階級中最低的一級，經常兼任當地教育所的教職。田北要離開利有亨社時，碰巧遇到暴風警報，南澳一帶山間道路崩壞，河流水位上昇，步行十分危險。根據事後一篇登在《臺灣愛國婦人新報》的報導，十七歲的莎勇和女子青年團團長蔦蓋·哈勇（十九歲）等人商量，決定替田北老師扛行李送他赴征途。據稱駐在所的警察官及田北正記鑑於路途險惡，辭謝莎勇等人的好意，但是這群女孩堅持送行。

於是，田北與莎勇一行人冒著風雨，一路無事走了八里的山路，到了叫作南溪的地方。從南溪到目的地——大南澳的公車站，還有一里，中間必須涉過溪谷，由於這幾天水位提高，當地人用圓木搭了個臨時橋，以利通行。這個時候，橋也被沖掉一半，要通過十分危險，但是，除此別無他路可循，眾人只有互相警戒，合力渡河。莎勇走到橋中，由於狂風暴雨的吹襲，加上行李的重量，腳步一亂，跌落滾滾濁流中，頓時失去蹤跡。田北一行人驚嚇中趕緊奔

回駐在所通報，附近部落的人都來應援，可惜搜救落空，只有莎勇替田北老師扛的行囊浮了上來。其後，再經南澳分室的警察官和各蕃社的青年團連日搜尋，還是不見莎勇的蹤跡，只好認定莎勇已溺斃。(2)

莎勇跌落溪谷是九月二十七日的事，二十九日《臺灣日日新報》有一小則新聞報導，標題為「蕃婦跌落溪流／行蹤不明」，內容云：「蘇澳郡蕃地利有亨社一四番戶戶主哈勇·麥巴歐六女蕃婦莎勇·哈勇（十七）二十七日早晨五時，由於利有亨駐在所柿田警手下山之故，與同社十一人一起送行，並為其搬運行李，由利有亨社出發，途中經過塔比亞罕社下方南溪上架設的臨時木橋時，失足墜落於因前一天晚上豪雨而漲水的激流中行蹤不明。南澳分室岡田警部補、巡查、警手指揮南澳高砂族，搜查結果，在距離墜落地點約十五丁（按一丁〔町〕約合109公尺）的下流，發見莎勇·哈勇所擔送的該警手的行李箱二個，但尚未發現屍體。」(3)

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地方人士為了悼念莎勇，在莎勇生前摯愛的母校利有亨教育所的廣場舉行盛大的慰靈祭（追悼會）。當時的總督府理蕃課長、州、郡關係課長、當地的警察官、莎勇的家人、教育所的學生，以及高砂族各社青年團的代表，都來參加；當時已加入作戰部隊的田北正記也打來充滿感激與懷思的弔電。(4)

簡單說來，這是個山地少女因為替出征的日本老師扛行李而不

(2) 以上敘述根據《臺灣愛國婦人新報》第112號（1939年1月），頁47-49。

(3) 《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9月29日，第7版。附註：此一新聞記事，有若干處與後來的資料有出入，如：1、住址後作「三十四番戶」，2、莎勇父親名字此處作「ハヨンマイマオ」，後作「ハヨンマイバオ」，3、莎勇等人送行的警手姓「柿田」，後皆作「田北」，4、行李發現處嗣後有作「二丁」（約218公尺）者。

(4) 《臺灣愛國婦人新報》第112號（1939年1月），頁49-50。

幸在暴風雨中殞命的故事，但是，在一九三〇年代末期，這樣的故事特別具有「時代魅力」。原因有三：首先，日本人對「純情」（じゅんじょう）的故事特別有偏愛，日文雖然大量採用漢字，其用法和涵義和中文時有不同。「純情」一詞，在中文通常是用來形容男女之間愛情質素的純粹；有時也有與愛情無關，光用來形容女子心性的單純、無雜質，如「純情少女」這樣的一個詞彙。日文的「純情」兼有中文這兩層意思，但又有以單純心性為對方犧牲的意思。在後項的用法裡，所謂的「對方」範圍廣泛，可以是國家、社區及尊長等等。此外，「純情」之作為形容詞，不是女性的專利。如果一個少年或年輕男子一心一意為公眾利益作犧牲或奉獻（不必然一定要捐軀），就可以稱之為「純情少年」或「純情男子」，此類用法，普遍見於戰時報章。一九四一年日本陸軍之「戰陣訓」也有一條曰：「忠誠之士亦必為純情之孝子。」莎勇不計安危，為老師扛行囊，以至於在暴風雨中跌落溪谷，葬身激流，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純情少女」。在戰敗前的日本文化裡，莎勇的故事，單純而動人。當然，這多半是生存者一廂情願的看法，誰也無由得知莎勇對田北老師的敬愛是否有到以身相殉的「純情」程度。也許，這樣看待一個青春生命的殞落，有助於生者解除來自因果關係的罪責感吧！另一方面，學生為老師扛行李，在當時的社會裡，恐怕沒有什麼自願不自願的問題，而是學生應盡的「義理」。

這個故事在當時引起日人重視的第二個原因是，莎勇是臺灣的原住民，當時稱為「高砂族」，對於臺灣的高砂族，殖民地統治者一直負有「教化」的使命。換句話說，日本統治者認為臺灣土著文化低落，須透過教育來改變、提昇原住民的生活習俗與宗教信仰。

莎勇的事蹟證明日本人教化高砂族的苦心沒有白費——莎勇的作為比諸日本女性毫不遜色，不愧為「大和撫子」。（撫子，花名，粉紅色石竹花；「大和撫子」是日本女性的美稱。）

其三，田北正記冒著暴風雨離開利有亨社是要為國出征。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後，日本軍國主義高張，社會籠罩著濃厚的軍國氣氛，男子赴征途在當時是無比光榮的事。莎勇等人不顧安危為老師扛行李，間接地回應了國家的召喚，同樣是英勇而光榮的。尤有甚者，莎勇在這種情況下喪生，更為軍人應召出征增添一抹悲壯的色彩，有助於鼓舞全民皆兵的氣概！

由於莎勇的事蹟有這幾層的含意，受到統治者當局的重視當不在話下。雖然莎勇屍骨無存，利有亨社族人在共同墓地上為莎勇建了個墓。那年（1938年）十二月六日，正在蕃地巡視的臺北州知事藤田俱治郎來到利有亨社，特地造訪莎勇家人，並到墓前燒香獻花。是夜，藤田知事眺望山川明月，感慨之餘作了一首詩贈送給利有亨社的青年團。(5)

從「蕃婦跌落溪流」的事故演進到愛國少女「莎勇之鐘」的故事，則當歸功於臺灣第十八任總督長谷川清。長谷川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接替小林躋造為臺灣總督。次年（1941年，昭和16年）四月十四日，長谷川總督為表彰莎勇的「愛國」事蹟，特地頒贈一只鐘給利有亨社以為紀念。(6)鐘的形狀像個銅鈴，確實尺寸不詳，似乎不大，人手可持，上面刻有「愛國乙女サヨンの鐘 昭和十六年四

(5) 《臺灣愛國婦人新報》第112號（1939年1月），頁50。

(6) 「『サヨンの鐘』授與式」相片，見《理蕃之友》第117號（1941年9月），頁5，頒贈儀式的相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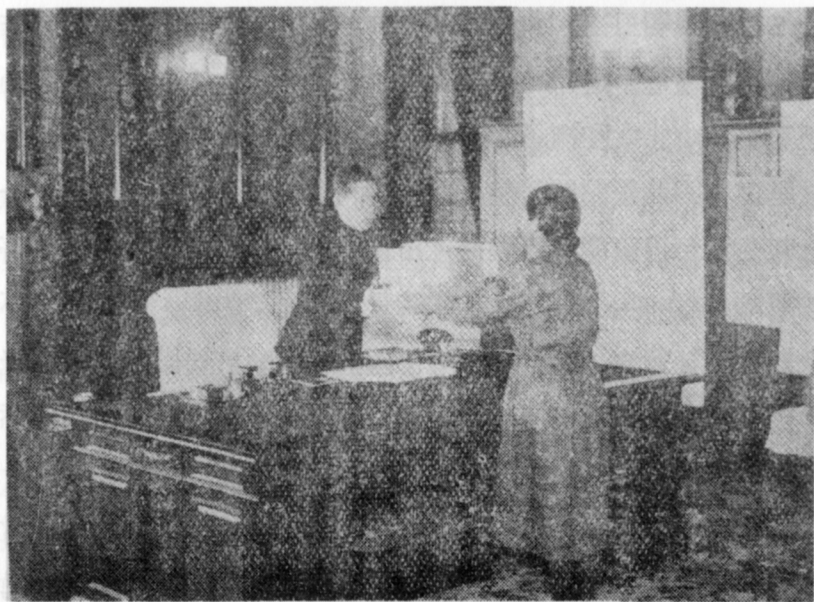


圖 2.1 「莎勇之鐘」授與式，1941 年 4 月 14 日於總督辦公室  
輯自《理蕃の友》第 117 號（1941 年 9 月）

月臺灣總督長谷川清」幾個字，<sup>(7)</sup>（「乙女」，日語，少女、處女之意。）一般稱為「莎勇之鐘」。《民俗臺灣》曾刊登松山虔三的攝影。<sup>(8)</sup>

在殖民體制下，臺灣總督儼然是臺灣的一方之君，地位崇高。莎勇的故事一經長谷川總督表彰，馬上馳名遐邇。利有亨社也由一個偏遠的小部落一躍而成為有名的蕃社，臺灣和日本的名士爭相表示要到利有亨社參觀。

長谷川總督贈鐘是四月十四日，同月下旬俳句著名詩人青木月

(7)《理蕃の友》第 117 號（1941 年 9 月），頁 8；臺灣總督府編，《初等科國語》卷五（臺北：臺灣總督府，1944），第十七課〈サヨンの鐘〉，頁 108。

(8)《民俗臺灣》4：9（1944 年 9 月），圖版，無頁碼。

斗由大阪獻贈四首以「莎勇之鐘」為題的俳句。<sup>(9)</sup>五月又有旅台日人鹽月桃甫背著畫囊親自到利有亨社作畫。鹽月桃甫，原名鹽月善吉，是西洋畫畫家，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參與創設臺灣美術展覽會（簡稱「臺展」），嗣後並擔任該展的審查員與幹事。<sup>(10)</sup>鹽月的作品完成後，當年七月一日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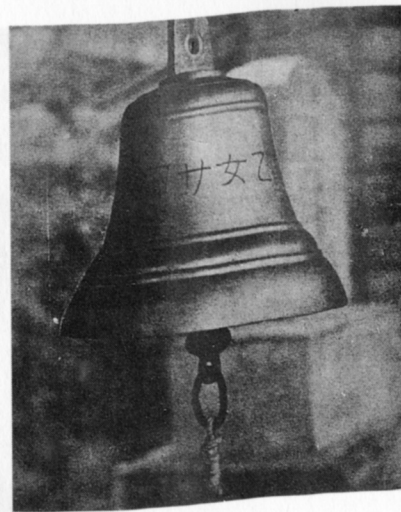


圖 2.2 「莎勇之鐘」  
輯自《民俗臺灣》4：9（1944 年 9 月）

在東京上野舉辦的第二回聖戰美術展中展出，展出的畫題即為「莎勇之鐘」。根據新聞報導，該畫五十號大，畫一個少女手持「莎勇之鐘」的姿影，少女面貌如莎勇之再生。據稱展出後，頗獲好評。此外，陪同鹽月桃甫到利有亨社作畫的另有陸軍美術協會會員鈴木榮二郎。鈴木也畫了一幅同樣題名為「莎勇之鐘」的畫，畫中莎勇手持日章旗（日本國旗），背上扛著田北老師的行李，冒著狂風暴雨前進。<sup>(11)</sup>無庸說，這幅畫的宣傳意味未免露骨了些。七月中旬，臺灣教育畫劇協會把「莎勇之鐘」的故事搬上「紙劇場」（紙芝

(9)《興南新聞》，1941 年 4 月 27 日（夕刊），第 2 版。

(10)關於鹽月桃甫的生平與畫作，可參考王淑津，〈高砂圖像——鹽月桃甫的臺灣原住民題材畫作〉，收於《何謂臺灣？——近代臺灣美術與文化認同》（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雄獅美術月刊社，1997），頁 116-144。

(11)《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7 月 24 日，第 3 版。

居)，作為該協會第一回連環圖畫說書的作品。(12)

「莎勇之鐘」不只是歌詠、繪畫的題材，也成為譜曲的對象。歷經中日戰爭或是熟悉這段歷史的人，都知道日本的軍歌與不少創作歌曲（或流行歌）在戰爭中扮演十分重要而奇特的角色。主題明白的軍歌如「海行兮」（海行かば）和「同期櫻花」（同期の櫻）等，不用說是到處可聞；創作歌曲只要多少切合戰時情境也往往為征夫所愛聽、愛唱，儼然有軍歌之概。這類「準軍歌」範圍廣泛，從「荒城之月」、「中國之夜」（「支那の月」）到日文版的「何日君再來」（晏如曲、長田恆雄詞），都包括在內。從一九三七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不少作曲家和作詞家以軍國精神為主題創作了不少新歌，「莎勇之鐘」這樣的故事當然不失為好題材。據說當時的名歌手渡邊はま子（わたなべ はまこ）看了關於莎勇的新聞報導，感動之餘寫信給臺灣總督府，表示「企望錄製哀悼莎勇之靈的歌曲」，(13)於是而有了這首至今仍為臺灣人傳唱的「莎勇之鐘」。



圖 2.3 鹽月桃甫繪「莎勇之鐘」（1941）

鹽月桃甫家藏明信片

(12)《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7月17日（夕刊），第2版。

(13)根據日本哥倫比亞公司（日本コロムビア株式會社）內部資料。

渡邊はま子是戰時著名的歌星，唱紅的歌曲有「中國之夜」、「愛國之花」、「雨中的荷蘭坂」。替「莎勇之鐘」譜曲及作詞的則是當時極負盛名的古賀政男（曲）和西條八十（詞）。職是，「莎勇之鐘」可說是集一時才雋之作，此歌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十日正式發表，歌詞分四節，訴諸浪漫的遐思，在此僅譯出第一節，以為例證，餘不贅錄：(14)

暴風起兮 山之麓  
湍流危兮 圓木橋  
涉渡者誰 麗少女  
紅馬伊唇 啊莎勇

每節最後都以「啊々莎勇」作結，充滿再三詠歎、呼喚的情意。

除了這首「莎勇之鐘」外，以莎勇的故事為題材的歌曲，尚有「少女莎勇」（少女サヨン）與「乙女莎勇」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同一題名為「莎勇之鐘」的長歌，由日本人木村富子作詞、杵屋勝太郎譜曲。筆者只看到登在《臺灣公論》上的歌詞，(15)不知曲調如何。由歌詞判斷，歌曲甚長，分三大段，第一段敘述田北老師應召出征，莎勇等人自告奮勇護送恩師的事情。第二段敘述莎勇跌落溪谷，眾人呼救無效。最後是合曲，歌頌莎勇的愛國赤誠與總督贈鐘盛事。這首長歌，辭藻華麗，恐怕得歸類為藝術歌曲。

演唱歌頌莎勇事蹟的歌曲，在臺灣蔚為風潮。一九四一年八

(14)此節之日文歌詞如下：

嵐ふきまく 峰ふもと  
流れ危ふき 丸木橋  
渡るは誰ぞ うるはしき乙女  
紅きくちびる あゝサヨン

(15)《臺灣公論》7:4（1942年4月1日），頁38-39。



圖 2.4 佐塚佐和子（前排左五）和母親（前排左四）等人於霧社合影

月，哥倫比亞唱片專屬歌手佐塚佐和子返台演唱「莎勇之鐘」，滯台期間曾受邀在總督官邸舉辦的「音樂與電影會」中獨唱數首歌曲，曲目包括「乙女莎勇」及「少女莎勇」。佐塚佐和子出生在臺灣，母親是泰雅族，父親佐塚愛祐警部在一九三〇年的霧社事件中喪生，因此，佐塚佐和子演唱「莎勇之鐘」實別具意義——代表高砂族已從浴血抗日邁入義無反顧為軍國犧牲的階段。如果讀者記得發動霧社事件的原住民正是泰雅族，則更能體會從殖民者觀點所賦予的意義。佐塚佐和子曾以感懷的口吻說：「我也是蕃社之子，莎勇さん代替我們作了這樣的犧牲。」<sup>(16)</sup>同年十月，浪曲界天中軒的

(16)《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8月23日，第3版。

新秀雲月小姐來台公演時，也曾受邀到總督府官邸，在長谷川總督與高級文武官員席前，用浪曲獻唱「莎勇之鐘」。<sup>(17)</sup>浪曲，又稱浪花節，是一種用三味線伴奏的民間說唱歌曲，類似中國的鼓詞，大多以義理人情為主題。

長谷川清以總督之尊大力表彰「莎勇精神」，從贈鐘到各種品題活動，使得「莎勇之鐘」的故事廣為流傳。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日長谷川總督為公務上京（東京）在門司港接受訪問時說：「送恩師出征途中，尊貴地逝世的愛國少女莎勇的心情，使我的心非常地感動。祈望全島民之心能像莎勇那樣。我因感激至極而贈鐘以慰莎勇之靈。讚美莎勇之死的聲音現正風靡全島。」<sup>(18)</sup>誠哉斯言。

頌讚「莎勇之鐘」的另一高潮是搬上銀幕。一九四三年松竹映畫（電影）與滿洲映畫合作，把莎勇的故事搬上銀幕，片名就叫做「莎勇之鐘」，邀請了當時紅極一時的滿映明星李香蘭來扮演山地少女莎勇。李香蘭為此專程來臺灣拍攝外景。西條八十與古賀政男再度合作，為電影「莎勇之鐘」作了主題曲「莎勇之歌」（「サヨンの歌」），並由李香蘭主唱。這部電影雖然以莎勇的故事為藍本，根據新聞報導判斷，實則添加不少戲劇性情節，臺灣的外景也不是在南澳，而是在霧社的櫻社拍攝的。<sup>(19)</sup>電影劇本刊登在《臺灣時報》。<sup>(20)</sup>此片因情節冗漫，票房並不成功。<sup>(21)</sup>

「莎勇之鐘」也像「國歌少年」一樣在戰爭期間走入臺灣的小

(17)《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10月29日，第3版。

(18)《理蕃の友》第120號（1941年12月），頁7。

(19)〈「サヨンの鐘」攝影見聞記〉（1）、（2）、（3），《興南新聞》，1943年2月23日，第3版；2月24日，第3版；2月25日，第3版。

(20)〈サヨンの鐘（映畫脚本）〉，《臺灣時報》第281號（1943年5月），頁106-127。

(21)田中純一郎，《日本映画發達史Ⅲ》（東京：中央公論社，1976），頁137。此一舊片

學教科書，出現在《初等科國語》卷五。<sup>(22)</sup>文章甚長，茲將中譯文附錄於文末，以供參考。在教科書中，莎勇被描繪成一位事父母至孝、尊敬師長、充滿愛國心的少女。課文中的莎勇又且非常勇敢，總是身先眾人，「義勇奉公」。這是再完美不過的人格了。在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莎勇如何以「理想樣式」重現於教科書中。



圖 2.5 李香蘭主演之「莎勇之鐘」劇照  
來源：松竹株式會社

綜上所述，莎勇的故事素材簡單，但因深符時代需要，成為一時炙手可熱的題材，被發揮得淋漓盡致。這在吾人歷史上不是先例，也不會是最後一樁。當我們檢視人類歷史的重大錯誤時，或許會發現歷史的錯誤相當成分是集眾人之自願而不自覺的參與所造成的。在一九三〇年代下半期與四〇年代上半期，日本的軍國主義把日本推向對外無限度的擴張與征戰，也推向最後的慘敗。

曾於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日起在國家電影資料館舉辦的「原影展——影像中的原住民」中放映，首映在霧峰（二十日），臺北特映在該月二十六日，地點是中央日報三樓放映廳。筆者有幸親眼欣賞一向只在舊紙堆中讀到的影片，內心頗為激動。但是，這部電影的確「情節冗漫」，無怪乎當時不賣座。

(22) 臺灣總督府編，《初等科國語》卷五第十七課〈サヨンの鐘〉，頁 96-109。

在軍國主義盛行之時，時代的氣氛一面倒，個人獨立的心智活動空間急遽減縮，不少人被迫做出違背真心的事，但同時也有不少人「自願而不自覺」地替時代推波助瀾，上面提到在銀幕上扮演山地少女莎勇的李香蘭即是顯例。

李香蘭原名山口淑子（1920-），血統上純係日本人，但生在中國、長在中國，又因拜李際春為乾爹而有「李香蘭」這個中國名字。由於李香蘭的北京話與日語一樣流利，因緣際會成為當時日本在中國東北（滿洲國）的文化統戰機構滿洲映畫的紅星。當時大部份的人相信（或被誤導相信）李香蘭是中日混血兒；<sup>(23)</sup>李香蘭也自然而然扮演起促進「日滿提攜」、「日華親善」的角色，成為日本對滿、對華政策的媒介之一。李香蘭在一九八七年出版的自傳《李香蘭——我的前半生》中，<sup>(24)</sup>對她半世紀前的這段過去有很深的反省與悔懺。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像李香蘭這樣自願而不自覺地為日本國策作奉獻的，尚不知其數。李香蘭幸而有戰後的四十年時光來比照今昔而獲得反省的機會，但有許多人則抱著他們的「純情」，在戰火硝煙中化為「護國之花」。

臺灣社會有它根源於歷史、文化的強韌主體性，但也有因受外來統治而導致的他塑性。研究日據臺灣史，有時不能不以日本史為參考架構，蘆溝橋事變後的戰爭期歷史，尤其如此。「莎勇之鐘」

(23) 1943年春天李香蘭來臺灣拍攝「莎勇之鐘」的外景時，曾接受《臺灣藝術》廖姓特派員訪問。當被詢及是否為日滿混血兒時，李香蘭明白說她是日本人，但廖特派員仍繼續追問，李香蘭說：「那就任您想像了。」（御想像に任せます）廖特派員似乎不願放棄李香蘭是日滿混血兒的傳聞，令李香蘭一度沈默不語。該特派員最後還稱讚李香蘭日語講得很好，李香蘭說：「那當然。因為是道地的日本姑娘……。」見《臺灣藝術》第36號（1943年6月），頁26-27。

(24) 山口淑子、藤原作弥，《李香蘭 私の半生》（東京：新潮社，1987）。此書有港譯中文版。

的故事及其周邊的波瀾，正是日本本土軍國主義的對外延伸，換句話說，是殖民國之軍國主義的「殖民地版」。在這則「莎勇之鐘」的故事上，我們可以明顯看出臺灣在此一特殊歷史情境中的被動性。此誠吾人當多加區別、留意處。

附記：筆者蒐集資料之初，承蒙日本東京川村節夫先生與加拿大溫哥華蕭林美智女士大力協助，訂補時利用了臺北周威權先生惠賜之資料，謹此一併致謝。蕭林女士（蕭太太）服務於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圖書館，於一九九九年二月病逝，年僅五十餘。蕭太太工作認真，態度親切，相信與她有過接觸的人，都有同感。重睹昔日誌謝之文字，而故人已杳，不勝哀思。

原刊於《歷史月刊》第四十六期（1991年11月）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增補修訂

二〇〇一年七月第二次訂補

附錄：《初等科國語》卷五第十七課〈莎勇之鐘〉中譯  
莎勇之鐘

距離靠著臨海道路的南澳約三十五公里的山坳裡，有稱為「利有亨」的村子，戶數約有五十。遠處西南的天空聳立著南湖大山的山峰，近處被覆著原始林的群山摩挲著白雲的裙裾，春有櫻花，秋有紅葉，把村子的景色妝點得很美麗。

莎勇·哈勇在這樣的山坳之村長大，昭和十年（1935）十四歲時從村子的教育所畢業，成為女子青年團的團員。父母對末子莎勇在教育所畢業後能更像個成年人，感到非常高興。然而，這樣的喜悅也是短暫的，該年夏天，母親得了重病臥床不起。莎勇非常地擔心，夜間也不眠不休持續看顧病人，然而，儘管如此費心，初次降霜的十一月初，母親終於過世了。不久，父親也多病，因此莎勇這會兒日夜為父親的健康而操心。

教育所一畢業，種種不幸接二連三襲來，對此莎勇感到再怎麼哭泣都不夠的悲哀，雖然如此，即使是童稚的心也非常明白不能因一身一家的不幸而給他人帶來麻煩，也不能怠忽公家的事情。莎勇幫助兩位兄長，勤勉作家事，另一方面，為了女子青年團不遺餘力地勞動著。尤其是支那事變〔蘆溝橋事件〕發生後，更奮不顧身地致力於後方的奉公。

上海攻陷、南京攻陷，新的昭和十三年也在戰勝的喜悅中，夏天很快地來臨了。就在此時，村子為在中國山野正進行的武漢攻略戰的戰況而沸騰起來，青年們精神為之大振，如果可能的話自己也想上戰場。在這種情況中，九月二十四日，教育所的老師也接到老師熱切等待著的召集令。



老師受到徵召的傳聞一旦傳開來，村人不用說，特別是平素承受教導的女子青年團團員以柔弱的少女心感受到不可抑止的感動。

老師將於二十七日出發，當天下山到南澳。人們來幫忙，行李的準備相當充分。然而，偏偏不湊巧，二十六日的傍晚開始，天氣急遽變化起來，山裡刮起了暴風雨。

是夜八時左右，女子青年團團員聚集在教育所，駐在所的人詢問是否可替老師搬運行李。一聽及此，莎勇最先說：

「我去。」

莎勇十分清楚：山裡起暴風雨是很危險的，但是，她認為報答師恩與後方奉公就在此時。

「恩師蒙受陛下之召，承此光榮之應召，因此，請一定讓我去送行。」

莎勇如此補充說明。

受此言辭所感的眾人相繼地說：「我也去」、「我也去」。

駐在所的人雖然為莎勇的言辭所感動，但看到莎勇才十七歲，身體還弱小，說：

「在這樣的暴風雨中，又且背負行李走三十五公里的山路，是很困難的。莎勇最好不要去吧！」

試著使莎勇放棄這個念頭。

「請務必讓我去！一想到在戰地勞動的軍人們，像這樣的暴風雨，實在不算什麼。而且，老師已經不是我們的老師，是日本的軍人。請讓我也背負軍人的行李！」

對莎勇充滿真心的言辭，駐在所的人眼角濕潤了。一旁並排而立的人們胸中也受到強烈的衝擊。

翌日就是二十七日，昨夜那麼強烈的暴風雨變得平靜了，天空也正像在慶賀勇士出門一樣。獲選的莎勇以及其他五人，各自背負著老師的行李，一邊手中英武地高舉著「日之丸」旗，比老師先著一步踏上下山之途。

彎彎曲曲的山路，幾乎都是攀爬在垂直的斷崖的半腰，一個人人都嫌狹窄的寬度。然而一如所擔心的，到處大樹連根拔起、岩石掉落，可怕的山崩也眼看就要發生，原本險峻的山路進一步變成危險的惡路。然而，一行人在途中一次也沒休息，一心一意趕著路。不料，到了十時左右，到現在為止暫時停息的雨再度變成豪雨，風也越來越強。雖然是大白天，激濺起飛沫的雨變得讓人感覺要連山崖和道路都沖走一樣，吹飛般地咆哮的暴風雨向森林狂呼、向山崖吼叫，如此一來，走路變得全然危險了。一行人好不容易掙扎到一間小屋，在那裡一邊避風雨，一邊等著老師。老師順道拜訪位於途中的駐在所，行道別之禮，因此遠遠落後於眾人。

雖然等了約一個鐘頭，還是不見老師的蹤影。此時，暴風雨愈來愈猛烈，天空的昏暗則讓人懷疑是不是已經黃昏了。不安的氣氛緊緊地向身子逼襲過來。

「說不定老師今天下不成山了呢。」

「那麼，我們就暫時折回去吧！」

隨著不安的增高，有人這麼說著。

「不，即令老師下不了山，我們約好在今天之內運送行李，因此，請務必走吧！」

莎勇熱切地建議下山。

一行人再度冒著暴風雨前進。濕答答的衣裾纏住腳，滑了好幾

次，但還一邊互相幫忙和打氣，加緊疲累的雙足。如此這般，一行人一面為暴風雨所苦，一面在下午三點過後，好不容易向著南溪的橋走下來。

橋是將兩根五、六公尺長的圓木綁在一起而搭起來的圓木橋，連接的地方用石頭堆高而支撐著。只要渡過此橋，此後到南澳就只有三公里左右，而且道路又寬又平。

眾人一看，由於夜來的雨，南溪水漲，濁流一邊捲起漩渦，一邊滔滔地流著。圓木橋因著濁流的響聲而震動著，時時被跳濺上來的飛沫沖洗著，此刻也像要被沖走一樣。一行人趕緊作好準備。莎勇也非常小心地脫下腳上的半統鞋。（「地下足袋」；譯案：是一種勞動用的膠皮底半統鞋，鞋之前端腳拇趾與其它四趾作分叉狀。）

終於開始渡橋了，一上橋就馬上翻捲到腳下的水流，像箭一般快速，眼睛昏眩起來。一行人小心翼翼，一步一步踏穩腳步。如此這般，突然，

「啊！」一聲尖叫聲。眾人吃了一驚，往那個方向一看，看到莎勇和行李一起跌落濁流的身影。

「啊，莎勇……」

眾人不禁叫了起來。

莎勇伸出手，不讓行李流走的樣子，但是，馬上被濁流深深地捲進去了。

「莎勇！」

「莎勇！」

一行人發狂般呼叫的悲痛聲沿著兩岸向下游、向下游奔流下去。然而，回答的只是激烈的水聲罷了，莎勇終於不見蹤跡。

現在，利有亨教育所的庭院中，在開著紅色美麗花朵的番紅花樹的圍繞中，並立著莎勇之碑和鐘樓。鐘上刻有銘文：

「愛國少女莎勇之鐘」。

這個鐘是長谷川總督褒揚莎勇的篤行而贈送的。

鐘鳴時，清亮而優美的聲音響徹高空。讚揚著愛國少女莎勇·哈勇。

皇民化運動是一九三〇年代下半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日本在殖民地推行的一項全面性的運動。這個運動涵蓋面十分廣大，觸及殖民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果我們說整個戰爭期間的殖民地歷史是「皇民化運動史」，似乎也不為過。但是，由於戰後的各種因素，在臺灣也好，在韓國也好，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十分缺乏。以臺灣史而言，戰爭期的研究還在起步的階段。近年來雖見少數與皇民化運動有關的論文，但題目各有偏重，但難建立基本史實架構與歷史解釋的「一段距離」。我個人認為這段歷史對我們了解光復後，甚至是現今的臺灣，關係重大。本篇論文是根據筆者博士論文的研

(1) 日本戰時皇民化運動研究會編，《皇民化運動史》，頁37-46；洪啟森，《臺灣皇民化「生活改善」運動》，《國史研究》第19期（1991年12月），頁37-46；洪啟森，《臺灣皇民化「生活改善」運動》，《國史研究》第19期，頁69-87；楊維德，《皇民化運動的臺灣女性化運動》，《臺灣研究》43-2（1993年6月），頁69-84。

(2) 王冬冬，《皇民化運動研究》，Wang Dongdong, "The Kōmeika Movement: Taiwan under Wartime Japan, 1937-1945,"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91。臺北於1991年3月臺灣大學歷史系主辦的學術研討會「Japanese Wartime Empire, 1937-1945」中發表論文「The Kōmeika Movement in Taiwan and Korea: Comparisons and Interpretations」，論文修改後，以第一編首次於 Peter Duus, Mark Postle, and Ragnur Magnússon, eds., *The Japanese Wartime Empire, 1937-194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19-41。